

客观、准确、深刻地认识当前宏观经济形势

■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院长 刘伟

本次宏观论坛报告可以用六个字形容——“客观、准确、深刻”。

首先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判断比较客观,是存在客观根据的。一个大的判断是“稳中向好”。所有的宏观指标都是在可控制和预期范围之内,经济增长速度 6.5%—7% 之间,通货膨胀率在 3% 左右,失业率在 5% 以下,对宏观经济的增长既不过热也不过冷,属于正常的宏观经济运行区间。宏观经济的运行指标和政府年度报告提出的目标均在正常波动范围之内。在预期和政策锁定的目标范围之内这是属于稳定的增长状态。稳中向好主要是增长质量的情况,报告里面提供了很多数据,如经济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的动能以及微观指标的变化。这些情况说明经济增长稳中向好的判断是有一些根据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一些舆论上不是很准确的导向。对于“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可以从几个方面理解:一方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取得一些成效,经济增

长的状况、效率状况有所改善;更重要的一方面是,“稳中向好”展示出新一轮的增长机会,经济尚未触底仍要下行但是具有新的发展机会。所有深刻的改革实质上都是危机导向的,才能推出更具有创造性和价值性的改革。

其次,对于“稳中有变”的分析是比较准确的。报告分析的很全面,涵盖宏观、微观、国内、国际方方面的因素。从宏观上来看,当前宏观经济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宏观经济的变化阶段性特征非常的明显,第一阶段 1978—1998 年通货膨胀,当时推行的是“适度紧缩”的宏观政策。第二阶段 1998 年下半年至 2010 年,宏观经济呈现需求疲软的特点。加之两次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出口受到较大的影响。尤其是在 2008 年以后采取的宏观政策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稳健的货币政策。第三阶段是是双重风险并存的新常态经济。既有通胀压力又有需求疲软导致的经济下行的风险,类似于上世纪 70 年代末西方世



界出现的滞胀。如此双重风险并存的局面,下行的压力要比潜在的通胀压力来得更强更直接一些。中国的消费需求,近年维持在平均

14% 左右的增长速度,但是 2014 年以后降到 12% 左右,今年不到 10%。在双重风险阶段下,投资、消费的问题导致下行的压力更加明显。目前需求和供给同时发生不利的变化,进而约束了经济的增长。

从微观主体的行为分析来看,企业、政府还有居民家庭都有一定变化,其中包括由于中美贸易摩擦所产生的对需求和供给的影响。

最后,对于“稳中求进”提出的要求较为深刻。“稳中求进”是我们的总基调,关键是要解决好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关系。稳中求进中稳就是需求要稳,要避免大起大落;经济如果过热就意味着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意味着深化供给侧改革失去了其本身的意义。供给侧改革本身就是为了应对需求疲软,通过提高竞争力来适应需求疲软的市场竞争。经济如果衰退严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地去产能调结构就是雪上加霜。尤其要关注失业问题,教育在中国脱贫事业中有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如果大学生出现失业高峰不是个人理想的破灭而是家庭发展的破灭,所以我们一定要高度关注大学生就业,这是国家的事。所以经济不能过冷,一旦出现问题就是社会大问题,此时加大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不可能的。所以“稳中求进”中的“稳”就是保增长,既防止过热也防止过冷。但是光“稳”不解决问题,“稳”只是一个前提。真正解决深层次的问题还是“进”,就是解决结构性的矛盾问题。但劣质的供给还不如无效的供给。我们并没有超越经济学家说的供给创造需求的年代,但是一定要实现创新。好的需求带动好的供给,好的供给再刺激新的需求,这样才是稳中求进的“进”。解决根本问题,不能盲目地刺激劣质需求、带动劣质的供给,否则未来的短期繁荣会意味着长期的泡沫。(注:本文系嘉宾 11 月 24 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年度报告发布会上的主题发言,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核。)

第十届全国虚拟经济研讨会南开举行

■ 聂胜阻

11 月 3 日,第十届全国虚拟经济研讨会在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举行。研讨会为期一天,以“马克思主义的虚拟经济理论与实践——纠正‘脱实向虚’倾向的中国方案”为主题,来自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国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等国家机关、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及学术期刊的 160 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全国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常务副主席辜胜阻担任本次大会主席。开幕式上,南开大学党委书记杨庆山会见了辜胜阻。

开幕式于当天上午举行,辜胜阻,天津市政协副主席赵仲华,杨庆山,民建天津市委主委李文海,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常务副总编辑王利民,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成思危基金评奖委员会副秘书长曹文炼,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等出席,杨庆山、王利民、曹文炼及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盛斌致辞。

杨庆山说,虚拟经济研究与国家经济发展及长期战略规划密不可分,正确认识与合理发展虚拟经济,事关国家大政方针与国家整体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希望通过本次研

讨会,为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出谋划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添砖加瓦。

王利民表示,希望通过本次研讨会汇聚真知灼见,关注“学术中的问题”与“问题中的学术”,为保障国家经济平稳发展贡献智慧,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学研究。

虚拟经济研讨会的召开与成思危基金的支持密不可分,曹文炼代表成思危基金在致辞中说,加强对虚拟经济的研究,对于防范金融风险、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改进宏观调控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南开大学是我国经济研究重镇,希望通过研讨进一步深入推动虚拟经济的学术研究和实践运用。

盛斌介绍了经济学院的办学情况,表示学院将进一步支持虚拟经济研究,取得更多成果,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开幕式后,辜胜阻、吴晓求、盛斌、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欣、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学术顾问刘骏民做大会主旨报告。

辜胜阻报告主题为“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位的理论与实践”,他认为,中国经济面临三大结构失衡: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失衡,房地产和实体

经济的失衡,这造成了实体经济“缺血”、“干旱”,存在着脱实向虚的倾向,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工业企业利润水平持续走低,出现了“金融热,实体冷”的局面,做实业不如炒房赚钱多、赚钱快,一些实体经济企业的实业精神衰退,呈现出“赚快钱”的急躁心态,基于投资回报率的差异导致脱实向虚,这一情况可以用马克思平均利润率规律理论清晰表述。

针对如何纠正脱实向虚的倾向,辜胜阻认为,要加快金融市场改革,建立多层次的“门当户对”的金融体系,大力发展面向创新创业的金融产品,发展普惠金融,推动小微企业发展。要处理好房地产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坚持“房住”,抑制“房炒”,供需结合治理房地产市场,加强对资金有效的引导和管理,优化房地产市场的供给,促进土地供给主体多元化,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特别是长租市场。政府要减税降费,助力实体经济轻装上阵,营造实业能致富,创新致大富的良好环境,重整实业精神,鼓励企业家聚焦实业,做精主业,通过财政收入的“减法”换取企业效益的“加法”和市场活力的“乘法”。企业要实施“归核化”战略,专注做好核心主业,坚持创新驱动

发展,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聚焦品牌建设,加快实现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从做大做强转向做专、做精、做优。要提高企业走出去的组织化程度,抱团发展,依托“一带一路”拓展海外投资市场,充分利用海外的优势资源开展国际产能合作,让企业“向上走”“向外走”。

吴晓求在报告中说,研究虚拟经济实际上就是要正确处理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开放给予中国经济巨大活力,也给了中国人民巨大的信心。改革开放 40 年的实践表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就要尊重市场规律,让政府在恰当的位置上引导经济发展,创造良好营商环境,实时调整相关政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能片面追求财政快速增长,而应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经济和自然环境的和谐,让公众能享受到经济增长的财富效应。中国金融重要的发展动力来自于金融创新,为社会提供多样化的金融工具、金融资产、金融组织形态,不应将金融创新妖魔化。

盛斌、刘晓欣、刘骏民分别就“中美经贸关系”“虚拟经济的运行方式、本质及其独特分析框架”“‘成氏定理’是国际收支的国内经

济结构基础”等主题进行论述。

本次研讨会还设立了“中国经济‘脱实向虚’的倾向与纠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与虚拟经济理论”“金融危机预警与系统性风险防范”“金融新业态与金融稳定”等四个分会场,以及“共话虚拟经济”圆桌论坛,与会专家学者分别就相关主题进行研讨。

据悉,“虚拟经济”是中国学者提出的原创性经济学命题,其理论源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特别是有关虚拟资本理论。其实践源于在金融自由化趋势下,对各类金融创新活动的性质、功能及其影响的研究。2000 年,在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的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支持下,南开大学成立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并举办首届全国虚拟经济研讨会,该研讨会两年一届,迄今已举办九届,成思危担任第一至八届大会主席。

本次研讨会由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成思危基金共同主办,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承办。

正确理解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 吴晓求

南开大学虚拟经济研究中心是成思危先生创立的,刘骏民教授继承和发扬,刘晓欣教授进一步发展和壮大。我与他们三位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只要有会我基本上都会来学习。

研究虚拟经济实际上就是研究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一直以来我们都在思考和探索这个问题。在处理这个关系时有几个节点是需要认真思考的:

第一,如何理解市场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1978 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就在探索这个问题:市场在经济活动中究竟处在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如何看待市场的作用?改革开放 40 年的实践证明,不是太大了?实际上,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国有企业与民营经济的关系,这些都体现出如何理解市场的作用。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成功经验,就在于我们尊重了市场经济规律,哪一天不尊重市场规律,哪一天不尊重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我们经济就会出大问题,就会走弯路,最终都要回到这样一个基本的规律上。这是第一点认识。

第二,如何理解政府的角色?这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讨论了很久,理论上是清晰的,但有时实践中则不清晰。我们时不时地过分夸大了人为的作用,过分夸大了政府的作用。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把握政府的角色非常重要。我们不搞新自由主义,完全没有政府,那不可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实际上就是一个政府在恰当的位置上去引导经济发展

的道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要清晰。

对经济周期的理解非常重要。当经济处在一个不太好的时候,如果我们仍然延续经济高涨时期的政策,那政策就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实际上,在当前中国经济趋势下,降税、减低成本是非常重要的政策。

政府的职能是为企业服务。企业碰到困难的时候要为其解决困难,要营造一个适当的环境,让企业度过困难。企业是财富创造的主体。企业发展了,财富才会源源不断。环境的营造、政策的实时调整是政府的职责。

政府不应以财政收入的增长为目标,这不是政府的目标。从一定意义上说,也不应以 GDP 的增长为目标。经济的良性循环、经济与自然环境的和谐,让老百姓能够享受到经济增长的财富效应和社会福利水平,是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所以,总书记在十八大闭幕之后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这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有时候,我们会忘掉这些根本的东西。经济的变坏不要完全归结于经济周期,那是一种推卸责任的办法。实际上,很多经济问题与我们的政策不到位或者错位有关系。我经常说,中国的财政政策不是一个合格的政策,没有宏观调控的功能,心中的目标永远是财政收入的增长。财政政策首先是宏观经济政策,是宏观调控的职能,必须要有宏观的视野,要站在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个方面,财政政策做得不够。

中国的货币政策远比财政政策做得好。说实话,要没有中国式的货币政策,中国经济增长保持 40 年是很困难的。有人经常批评我们的 M2 增长太快,货币超发。我是个金融学教授,我从来不写货币超发这样的论文,有些人不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奥秘。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其中的奥秘。中国经济的成功,首先,

11 月 3 日,第十届全国虚拟经济研讨会在南开大学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教授出席并发表题为《正确理解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的演讲。本文根据录音整理而成。

当然是体制改革。改革释放了人们的积极性、创造力。中国人只要不捆住手脚,不束缚思想,就有无限的创造力。40 年经济增长首先是体制改革推动的,体制改革得益于思想解放,思想解放是社会进步源源不断的动力。没有思想的解放,社会经济就会停滞。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首先是基于思想解放。

第二是对外开放。现在我们都总结改革开放 40 年的成就。开放给中国注入了巨大活力,开放是改革的核心,没有开放,改革就找不到目标。只有开放才能找到改革的目标,才能知道我们的体制必须与先进的管理体系、经济规则相对接,与文明世界相对接,与市场化规则相对接,与全球化规则相对接。所有这些只有开放才能完成。所以开放给了中国经济巨大活力,也给了中国人巨大的信心。

40 年前,我们的国家贫穷、落后、封闭,今天的中国正在迈向现代化,且自信。自信是通过开放形成的,开放给我们带来大量的资金。过去,我们外汇贫乏,1978 年全国的外汇储备只有 1.67 亿美元,今天外汇储备基本稳定在 3.1 千亿美元——从 1 亿多美元到 3 万多亿美元是多么大的进步。

小平同志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在那个环

境下,能做出改革开放这样对未来中华民族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决策,那是要有超人的智慧和勇气。

第三,科技和人才对中国经济 40 年的增长非常重要。有些人试图否认中国大学的价值,我从来都是反对的。没有中国大学的发展,没有为世界培养这么多的人才,中国经济不会有今天。从 70 年代末到 80、90 年代,我们培养了数以百万计的优秀人才,他们都是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下培养出来的。他们思想没有束缚,有理想、有才干、有担当。40 年两代人改变了中国,发展了中国。所以,没有思想禁锢的人才特别重要。

第四就是金融。从技术层面看,如何理解经济与金融的关系,非常重要。财政政策对中国经济的作用微乎其微,货币政策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走了一条货币政策与中国经济增长独特的道路。中国经济的外向性和外汇管理制度,使我们有相当充裕的金融资源,以推动中国经济的增长。在这种条件下,中国的金融资产膨胀速度比经济增长快得多,大概以两倍的速度在膨胀。1978 年中国经济货币化率 0.3 左右,现在是 2.1。

长期以来,我们非常巧妙地运用了金融资源来推动经济增长,善于利用金融杠杆去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在过去一个时期,过分强调去杠杆,我是有不同看法的。过度去杠杆对实体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和金融有很大的负面性,为未来的金融动荡埋下了种子。本质上我是不太赞成去杠杆,赞成优化杠杆,反对在金融体系内搞杠杆游戏。金融对实体经济的作用,本质上是通过杠杆来完成的。金融对实体经济的作用,除运用杠杆以外还必须通过改革来提升。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不仅仅是贷款融资服务、支付、并购、财富管理,信息这些都是金融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的重要内

容,所有这些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完成。

首先是市场化方向的改革。金融通过多样化的金融产品、金融工具为实体经济服务。融资者需要多样化的融资工具,财富管理者需要多种金融资产;只有改革金融结构,才能满足实体经济的需要。金融最重要的是创新。一段时期以来,我们严重误读了金融创新,以为金融风险都是金融创新带来的,我不赞成这个判断。中国金融重要的发展动力来自于金融创新,来自于为社会提供多样化的金融工具、多样化的金融资产、多样化的金融组织形态。不要妖魔化金融创新。

我对上半年的金融监管是少有的进行批评的学者之一。那时,我讲过,我看不懂这种运动式强监管的目的是什么,把很多资金渠道都切断了。金融体系需要大江大海,也需要小溪小湖,只有大江大海是不够的,还必须保持小溪、小河的流动。小溪、小河是为小微企业服务的。中石油、中石化、一汽等大企业很重要,但数以百万计的小微企业也很重要。主动脉很重要,毛细血管也重要,毛细血管堵住了,人体就会腐烂,别看仍然活着,但很不美、很不舒服。金融监管对金融发展趋势规律要有深刻的洞察力和把握。

现在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10 月 31 日中央政治局做出了正确的判断,11 月 1 日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偏离了正确方向。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首先是改革开放和创新,其次是金融的科技化。我们必须通过高科技来推动金融的变革。金融的变革主要通过两种力量来推动:一是,通过市场力量脱传统金融融资的煤;二是通过科技力量脱传统金融支付的煤。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市场的力量很大,科技的影响很大。

(转自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